



政治科 學季評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BOOK REVIEW

二〇一二年九月 第三十五期 September 2012 No.35

ISSN 2222-6788



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908號
台北杭南郵局
雜誌交寄

《長篇書評》

梁子稷

從論戰策略到對時間的反思：尼采的歷史論述

- | Nietzsche and the Drama of Historiobiography | Roberto Alejandro
- |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 Christian Emden
- | The Flame of Eter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Thought | Krzysztof Michalski
- | Nietzsche's Animal Philosophy: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Animality of the Human Being | Vanessa Lemm

《短篇書評》

張祐寧

On China | Henry Kissinger

劉昊

氣候變遷的政治學 | Anthony Giddens

謝濬帆

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 | Yves Tiberghien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 從論戰策略到對時間的反思：尼采的歷史論述 梁子稷 1

Roberto Alejandro Nietzsche and the Drama of Historiobiography

Christian Emd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Krzysztof Michalski The Flame of Eter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Thought

Vanessa Lemm Nietzsche's Animal Philosophy: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Animality of the Human Being

〈短篇書評〉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張祐寧 10

Anthony Giddens 氣候變遷的政治學 劉昊 13

Yves Tiberghien 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 謝濬帆 18



政 治 科 學 季 評

二〇一二年九月 第三十五期

資深編輯顧問

王業立、石之瑜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鄭楷立

編輯委員

江俊宜、余宜娟、陳亮宇、陳瑋鴻、蘇軍璋、魏龍達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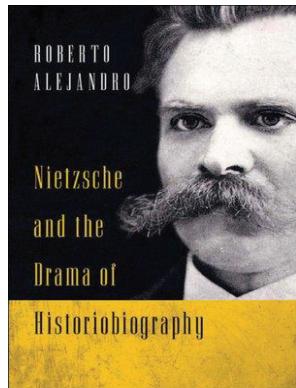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從論戰策略到對時間的反思：

尼采的歷史論述

梁子稷 / 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



書名：Nietzsche and the Drama of Historiobiography

作者：Roberto Alejand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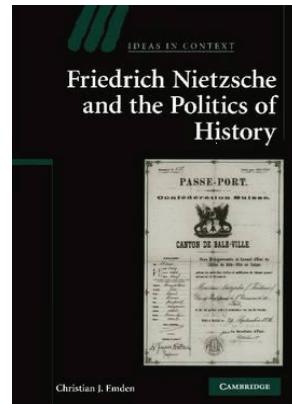
出版者：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出版地：Notre Dame, Ind.

年份：2011

頁數：376 頁

ISBN：9780268020378



書名：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作者：Christian Emd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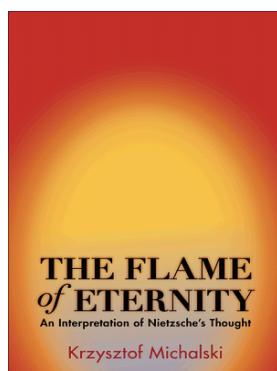
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年份：2011

頁數：404 頁

ISBN：9780521155076



書名：The Flame of Eter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Thought

作者：Krzysztof Michals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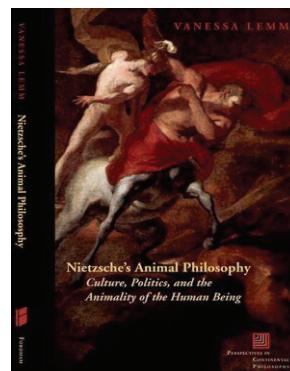
出版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Princeton

年份：2012

頁數：240 頁

ISBN：9780691143460



書名：Nietzsche's Animal Philosophy: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Animality of the Human Being

作者：Vanessa Lemm

出版者：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2012

頁數：256 頁

ISBN：9780823230280

區克夏（Michael Oakeshott）曾說我們不應該把文明想成「某種穩固與外在的東西」，文明實際上是一場「夢」，「在此世睡去所夢者」即是文明，而夢的本質是「迷思」（myth），它是對「人類生活之謎的感知」而非解答（Oakeshott, 2000：159-60）。這種「夢」的經驗有些類似閱讀尼采的感覺，我們找不到一個核心，更不用說是體系，像是「利維坦」之於霍布斯，閱讀尼采像是碰上一個力的向量交會的場域，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主題在某個點上交會或輻射，在這個夢的力量場域中，讀者跟著被帶往這裡，被牽引到那裡，這些力量並不匯聚在一個核心的主題，甚至連場域的界線都可能是模糊的，這是尼采書寫所獨有的生命力（vitality），有趣的是，尼采也常以「夢」來表述這個生命力的躍動與迷醉狀態，而尼采正是在這個生命力之上，碰上了最為僵固與頑強的對手，也就是「歷史」（或者，「飽含生命力」的寫作策略正是為了對抗歷史？），這是尼采做為哲人的自覺，如 Lampart 所說，「哲人當前的使命是揭露西方邪惡的精神史，重新理解並闡明時間與存在」（Lampert, 1993：288）。本文將透過四本新近出版的著作，來評述當前學界對於尼采歷史論述的反思，粗略地說，Roberto Alejandro 的《尼采與歷史書寫的戲劇》以及 Christian Emden 的《尼采與歷史的政治》都將尼采的歷史書寫視為對抗當時時代氛圍論戰性策略；而 Krzysztof Michalski《永恆之火：一個尼采思想的詮釋》與 Vanessa Lemm 的《尼采的動物哲學：文化、政治以及人類存有的動物性》則特別關注尼采歷史論述

中對於時間性問題的關注。

強調尼采寫作所具有的生命力，強調閱讀尼采的如夢一般的迷醉體驗，並不代表尼采這些書寫是憑空而生，對此，Emden 與 Alejandro 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尼采書寫的歷史脈絡。Emden 在《尼采與歷史的政治》中指出，在尼采於 1866 年到 1869 年之間的筆記中，一個核心的關懷是歷史知識與方法的哲學地位，這構成尼采智識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與德國哲學巨人康德的抗衡，尼采在康德身上發現了形構當前歷史知識地位的批判哲學工具：拒絕歷史目的論解釋的價值以及德國觀念論對歷史哲學的著迷，尼采要做的是從不同的視角提出在現代文化中歷史知識的智識價值（Emden, 2008：7-8）。Emden 指出，尼采對於歷史知識地位的反省，並不單純只是智識上的思辨，而同時也是一種「政治批判的歷史策略」，在歷史寫作上尼采援用了 19 世紀「最為科學」的修辭，也就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Emden, 2008：11），這樣的歷史寫作一方面批判的是目的論式歷史書寫的價值取向，尼采的系譜學歷史書寫否認人類歷史的道德進步論，對尼采而言，對抗「善與惡」進步論不是提出另一套價值體系（如同其同時代的道德史學家），尼采用以論戰「善與惡」道德體系的武器是自然主義取向的歷史方法，用它「追溯源頭」，指出其乃是對「好與壞」的替代。

尼采並非主張重新回到「好與壞」的評價體系，這樣的主張就與其他道

德史學無異，尼采所要指出的是道德體系背後的權力關係，這是真正的歷史精神，如尼采在《道德系譜學》中所說「歷史精神自身卻與道德史學家相左…這些道德史學家的思維就跟陳舊哲學家的習俗一樣，本質上都是非歷史的」(II, 1)。透過對歷史脈絡的關注，Emden 相信尼采也同時透過歷史書寫進行政治批判，對尼采而言，「偏見意義下的道德無法外於政治的場域，而是創造了直白的政治宣稱」，政治宣稱需要一個排除異己以建立同質性的道德規範體系，「無論是訴諸理性的自由主義或更為威權的生命方式，他們都需要絕對來排除威脅其同質者」(Emden, 2008: 229)。對尼采而言，排除異己的同質化道德論述用一種「去迷思」的「科學」姿態建構了它在政治性概念上的絕對主義立場並宣告了理性的勝利，這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中變的顯明，對尼采而言，系譜學不只處理道德價值與其演進的問題，也同時是對十九世紀的政治文化的診斷(Emden, 2008: 13)，這個診斷在於「探究道德共同體的歷史型構」，這是系譜學的政治相關性，也就是追問那些在現代政治文化被隱蔽著的，但卻對於規範論述不可或缺的，已經為人們所習以為常「被造成絕對規範」的道德假設，尼采的結論是尖銳地指出「現代性與現代國家的文化境況仍然為複雜的迷思臆想 (conjecture) 所形構」(Emden, 2008: 11)。

相較於 Emden 對於尼采書寫歷史脈絡的關注，Alejandro 的《尼采與歷史書寫的戲劇》則指出尼采的系譜學

歷史書寫與其生命困頓之間的關連，Alejandro 指出，尼采用以解脫（也是尼采自身）生命無意義的苦惱煩悶 (anguish) 的策略有三：第一是是對於自己在人類歷史中的誇大；第二則是他的永劫回歸概念；三則是其和解的哲學 (Alejandro, 2011: 7)。尼采的歷史書寫像是一場戲劇或一個故事，這個起源與未來可能性的故事傳達了歷史與個人故事之間，歷史與自傳之間的連結，Alejandro 我稱之為「歷史自傳」(historiobiography)，這是「一種相信生命中藏著解譯人類生命整體密碼的信念」，尼采同時是自己作品的作者也是其中的演員，這些多樣的角色都有著相似與一致的情節：「肯定生命可能性的腐蝕、虛無主義的前景以及力挽狂瀾的無畏使命」，藉此，Alejandro 反對把尼采視為擁抱虛無的虛無主義者，指出這些生命的劇本「暗示尼采仍舊受到意義形而上學的影響」(Alejandro, 2011: 27)。

Emden 與 Alejandro 固然在取徑上各有所長，但他們都同意尼采歷史批判的針對性格，無論這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弊病或是哲學對於無意義生命問題的無力，這對澄清「對尼采的偏見」頗有助益，Emden 的歷史性考察澄清了對尼采「英雄主義」的指控；Alejandro 則是透過尼采對意義問題的關注回應了「相對主義」的指控，因此，兩人共享了尼采反思的起點，那就是人在病態世界中的受苦，這是 Michalski 《永恆之火：一個尼采思想的詮釋》一書開篇對尼采的定位，對尼采來，「哲學是一種拒斥的後果，正是這個世界給我們的痛楚保證了其知

識」，在這個世界中「人性病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病了，而哲學的任務應該是從病態的桎梏中解放人性與世界」(Michalski, 2012:2)。同意這一點似乎不足為奇，畢竟，如果哲學不是單純地用來滿足好奇心，那麼似乎也應該要是為人在世界中的苦難提出解釋。如果這個尼采哲學的出發點結合尼采對歷史論述的關注，不妨得出一個大膽的結論：人在世界上的苦難正來自於歷史，正來自於歷史的某種時間性結構！這是 Michalski《永恆之火：一個尼采思想的詮釋》與 Lemm 的《尼采的動物哲學：文化、政治以及人類存有的動物性》兩書的共同主題。而這個結合人的在世苦難與歷史論述的問題意識也補足了 Emden 與 Alejandro 兩書的不足，也就是說，尼采對於歷史論述的關注不僅僅是把歷史書寫當成一種論戰性的策略（無論是針對現代政治文化的批判或形而上哲學意義體系的補完），它同時也包含對於歷史與時間問題更為深刻的關注。

Lemn 通過文明與文化的對比，指出尼采如何通過系譜學的書寫把被歷史所壓抑的動物性重新帶回來，而這一動物性的回歸（而非「回歸動物性」的懷舊訴求）則提示了重新看待歷史的可能，動物性的回歸是要讓人類的「遺忘」能力回歸，「歷史要轉化成為一種詮釋的技藝有賴於動物般遺忘能力的回歸」(Lemn, 2009:87)，Lundy 指出，尼采抵抗歷史與歷史知識那窒人力量的解方分別是「去歷史」(ahistorical) 與「超歷史」(suprahistorical)，尼采說前者是一種

「意識的一點白版」；而後者，則是透過意識的張力化，強迫性地完成這個世界，肯定在每個個別時刻中個殊的意義，可以說去歷史與超歷史都是生命力量的體現，各自體現無辜 (innocence) 與傲慢 (arrogance) (Lundy, 2009:193)，如果說 Lemn 所提出的動物性及其遺忘能力的回歸可以算是 Lundy 所說的「去歷史」解方，那麼 Alejandro 所關注的毋寧是尼采「超歷史」解方，Alejandro 否認尼采的系譜學具有知識論意義上的優勢，它像是花招 (device)，「體現了一個當前流行的概念一旦與其起源相比，有多麼不同與武斷」，於是系譜學就像是「邀請我們從一個新的基點來重新看看與思考」(Alejandro, 2011:10)。

無論是訴諸「遺忘」的「去歷史」或訴諸「花招」的「超歷史」解方，都可以看做鬆解舊有歷史敘述的一種方式，那麼舊有歷史敘述有什麼問題？在《道德系譜學》中尼采把問題歸結到人類文明的過程、一種關於記憶的能力以及人類受苦 (suffering) 三種之間的糾結，尼采指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人類培養出了一種對立於遺忘的能力，這就是「記憶」的能力，這不只是一種被動，對於深刻印象無法擺脫的記憶，而是主動並不願失去印象的記憶，尼采稱之為「意志的記憶」(memory of the will; Gedächtnis des Willens)，這是尼采對文明的界定：一個在原始的「我要」與意志的真正爆發之間，通過意志的記憶所塞入的，尼采稱之為「陌生且全新」的世界(II, 1)。這個新世界是歷史敘述的場域，

同時人類也在其中受苦，對尼采而言，受苦是一種因記憶而成的歷史的後果，人因為不知道如何忘記，因為記憶，所以只能專注於意識的痕跡，因此產生了怨恨與仇視，這是尼采所謂的「內疚」(Bad Conscience)，這是為什麼尼采在《不合時宜的沈思》中說「有了過度的歷史，人類存有就不再存在」！

對尼采而言，為了克服因記憶所帶來的歷史重負，人類必須「重新拾回」動物般遺忘的能力，在《道德系譜學》中尼采強調，遺忘不只是一種慣性，而是一種積極而正面的能力，它的作用「像是門衛，一個心靈秩序、寧靜與規矩的守護者」，沒有遺忘，「就沒有幸福，沒有歡愉，沒有希望，沒有自豪，沒有現實的存在」(II, 1)。遺忘的能力不是單純的「忘記」，更精確地說，它是一種「轉化過去」的力量，讓記憶的歷史重負可以鬆解，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拾回人的生命力，不再為內疚所苦。因此，當尼采訴諸「動物」的意象來談論遺忘時，他所指的並不是「回歸動物性」的懷舊幻想，尼采的「動物」不是科學家所理解的動物，而是「詩人所想像的動物般的生命」(Lemn, 2009: 88)，它的特徵是「力量的躍動」，如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所說，「對動物來說，所有的東西都躍動著」。

正是通過動物性遺忘能力的回歸，重新書寫另一種歷史進而恢復人躍動的生命力，如 Lemn 所說，「動物般遺忘的能力開啟了一種對過去的解放性介入，扭轉了時間的長流」

(Lemn, 2009: 91)，尼采不無嘲諷地說「許多人無法成為思想家單純因為他的記憶太好」(轉引自 Lemn, 2009: 94)，這不單純只是說「記得太多東西」，而是說因為記得太多東西，因此忽略記憶與遺忘之間的動態作用，這是尼采式的「去歷史」，通過「對立人的記憶與動物的遺忘能力」，讓人可以肯定自身「作為能遺忘的歷史存在」，這麼一來，「同時也在其記憶中發現創造性的生命力量」(Lemn, 2009: 87)。

Lemn 強調的是，動物般遺忘的能力一方面讓歷史能以另一種更充滿力量的方式顯現，另一方面，也讓承受記憶重負的人得到轉化的可能，「記憶」就通過遺忘而成了「許諾」的能力，而不再只是關注意識的痕跡，關注身體所留下痛苦的能力，動物性的回歸並不是為了讓人成為獸，而是讓人成為「新人」，Lemn 的結論是「生成為人不是一個對抗動物或遠離動物的運動，而是一種動物的回歸，而是回歸到動物，一種遺忘能力的回歸，成為對人類動物生命與生成不可或缺的力量」(Lemn, 2009: 92)。遺忘的能力使得歷史從一種必須為了知識的積累而必須「記住所有事情」的歷史，變成一種知道如何遺忘的歷史，這意味著，記憶不是為了記住東西，不是知識與真相的工具，而更像是一種，像作夢一般，想像的力量 (Lemn, 2009: 99)，這種力量能服務於生命，它讓歷史，讓時間的延續成為力量的脈動，如尼采在其論戰性十足的〈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弊〉一文中所說，這是真正「歷史的人；對過去的觀察使他們湧向未來，點燃他們的勇氣來

更長久地與生命較量...他們之所以回頭只是為了藉由對迄今以來的過程的觀察來理解當下，並學會更熱烈地渴望未來」。生命與歷史的關係不再只是壓迫與窒息，這是尼采眼中的「另一種歷史」，尼采稱之為輕狂（youth），輕狂用像是對待神諭般對待過去，神諭，作為在接受者耳中依然迴響的訊息，尼采這麼說「過去的聲音就總像是神諭的聲音，只有在你是未來的建築師並對當前嫋熟，才能明白過去的，神諭般的聲音」，歷史作為對於過去的理解，總是在行動中，總是才得到意義。

「回歸動物性」的「遺忘能力」是一個轉化性的隱喻，它用以指涉時間性意義的轉化，讓生命從對過去的承載中釋放出來，Lemn 以此來闡述尼采對於「文明」（civilization）與「文化」（culture）對立關係的論述，對尼采而言，文明的特徵是忘卻動物性與忘卻動物般的遺忘能力；而文化則是相反，是記憶動物性與記住動物般的遺忘（Lemn, 2009: 10-11），Lemn 指出，文明進程的目標是人類道德與理性的改良，而相對的，文化的作用是顯示理性化與道德化乃是針對人類動物本性（animality）的宰制技術，文化揭露了所謂文明的改良不過是虛假的征服，因此，文化第二個使命是解放，文化所提出的挑戰並不是提出某種讓形式壓過生命的生命形式，而是充盈著生命流溢著生機（full of life, overflowing with life）的生命形式」（Lemn, 2009: 11），強調文明與文化的對立關係是重要的，因為通過這樣的分析尼采對於文明的批判就不單指

示回歸自然而已，而是指出了文化高於文明的角色。在這組文明與文化的對立關係中，尼采所企圖恢復的是文化之於文明的生命力，對尼采而言，相比於（耗盡與壓抑生命的）文明，「文化的挑戰是帶出生命與思想的多種形式，這並非生命的形式壓過動物生命，而是充盈生命」，文化恢復了生命的完整（Lemn, 2009: 4）。

因此，與其說文化與文明不是時代的連續，並不是指「放棄」文明「回歸」文化，Lemn 特別強調這組對立關係在於分別兩種不同的生存樣態，「動物性遺忘」是一種形象上的隱喻，它的目的是「為帶回人類創造力與自由，提升其夢想生活的能力」因此，文化作為動物性的記憶「不能與回歸獸性的自主行動混淆」，而是一種人「對於回歸動物性的開放」，這意味著，不同於文明，「文化的記憶不是主宰或宰制過去（或生命）的工具，是一種敞開狀態（openness），而是「動物的自由的創意，在記憶中奔發而不受控制」（Lemn, 2009: 26-27）。Lemn 的論述理路是，透過指出尼采對動物性作為某種生命活力的象徵，來對照出文明與文化作為不同的生成（becoming）樣態，而這組對立提供了如何透過尼采重新思考歷史（特別是作為線性時間的歷史）的可能，重新思考「另一種歷史」的可能，這是尼采的「超一人」（over-man）的意涵，「超一人」不同於「超克一動物」（over-animal），超克-動物的前綴詞「超」指涉一種人性超越動物本性的垂直關係，與此不同的是「超-人」是人性與動物本性處於對抗關係的水平

關係，尼采常用「橋」或「風」來表示這個水平的對抗關係 (Lemn, 2009 : 21)。

Lemn 的結論是人「健康的」生成是維持人性與動物性之間的抗衡關係，歷史之所以成為重負是因為人的記憶能力抹消了動物般遺忘的能力，「健康的」文化不是回歸獸性，而是讓人性與動物性，讓線性時間與生命力量持續處於動態的關係，對此，Michalski 的《永恆之火：一個尼采思想的詮釋》關注的即是在尼采思想中生命與時間的動態關係，Michalski 的詮釋別緻之處在於指出兩種意義有別的「永恆」的緊密關係，第一個意義的永恆指的是線性時間的無限延續，對尼采而言，正是此一時間的無限延續構成人的重負，這是線性的虛無性格，「時間如此傷人！死亡如此令人驚恐，神秘的陰影，無法理解的陰影，沒有辦法從這個恆常變動的世界中抹去，讓我們惱火，讓我們傾向於忽略那些變化著的物事，讓我們傾向尋找那些很徑直地存在著的，然而這是我們所有的唯一現實：痛苦、畏懼與不解。時間」(Michalski, 2012 : 92)，這個永恆本質上是虛無，「讓人真正驚恐的是我們概念的孱弱，是我們根基的匱乏，是我在空無中被懸置著，最後是這個我無以迴避的空無」(Michalski, 2012 : 44)。在這個時間樣態中，人被馴化，被文明馴化，人透過文明創造出可以超克虛無的幻象，Michalski 說「我們活著與生存著的能力有賴於世界本質上不變」，而這意味著「我們存活的能力也有一個惰性 (inert)，被動與缺乏創造力的面

向」，這樣的生命樣態「這是適應，發現而非創造」(Michalski, 2012 : 99)。

Lemn 與 Michalski 都處理到尼采歷史書寫中一個核心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擺脫這個虛無的生命樣態？與 Lemn 相同，Michalski 也指出「超克」虛無並不是代換上另一組價值，「肯定生命從而不是一種替代的，反思的評估行動，而是生命自身。重估價值指的不是換上一套價值」(Michalski, 2012 : 10)。同時，與 Lemn 「讓生命在動物性中敞開出來」的命題相同，Michalski 也指出了這個虛無的時間境況，與生命的躍動狀態兩者事實上相互依存，這是 Michalski 對尼采式遺忘的詮釋，遺忘的能力「一種將現實體驗為時間性意義上未加分化的能力，所謂的曾是沒有意義」(Michalski, 2012 : 21)，而這個時間性意義上未加分化的時刻正是「生命可以滋長的氛圍」(Michalski, 2012 : 20)，尼采常用「兒童的遊戲」的隱喻來描述此一未加分化的時間性結構，也就是「時刻」(moment)，但同時，Michalski 指出，這個遊戲與被時間所打擾而終止必然相連，這是在線性時間中「真正被遺忘」的開端，這個開端的「時刻」就是時間的原初與根基，沒有它，時間（過去當下與未來的分化）就無法理解」(Michalski, 2012 : 18-19)。Michalski 的結論是，「孩童的遊戲與成人生命的爭鬥，遺忘的幸福與記憶的幻象、重負以及鎖鍊，乃是一體兩面，人之境況的兩個面向」(Michalski, 2012 : 25)。

因此，在 Michalski 看來，作為時

間之重負的「永恆」時間性結構是永恆的面向之一，但尼采別緻之處在於指出人無法擺脫這個永恆，人沒有出路，人們最終會發現「所謂哲學、宗教或科學所謂的理念世界或事實自身，都是同樣的幻相，人的幻相，所謂的終極的善或無所不包的整體性。流變生成的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Michalski, 2012: 4)，永恆的另一個面向就在於肯定這生命的流變，接受這個主體作為身體欲力集成始終處於流變，根本上無法透過文明轉譯的晦澀難辨。比之 Lemn, Michalski 更激進地主張時間性的虛無境況正是生命的生成境況，這是尼采永劫回歸 (eternal return) 的教誨，永劫回歸是對於存在每一個當下都是必然的意志化 (willing)，對於作為每一個當下與時刻的肯定，這也就是是對妒恨的回應與克服。這是永劫回歸的「永恆」，任何一個時刻都是生命重新躍動，重估價值的時刻，Michalski 這麼說，「生命不只是物事恆常變化的過程，也是意義恆常變化的過程。衰敗能轉成生長，死亡能轉成誕生，端賴我們所援用的指涉體系」(Michalski, 2012: 33)。所謂的奴隸道德就其理念型，所指涉的是一種被動性，如果人類無法擺脫時間與過去的重負，這就意味著人將永遠處於一種被動狀態，同時也意味主人道德的不可能，因此奴隸道德不必要被拒絕，拒絕奴隸道德意味著拒絕歷史的重負，尼采已經表明這絕無可能，奴隸道德需要的是變形，一種「去意願化」的變形，如同尼采「獅子必須變化成孩子」的隱喻，如尼采所說「可是，是我願意它如此！我將意願它如此！」，意志的意願性，

一再地被一種不定性所消解，但意願同時又凝結每一個當下中，接著「孩子」的純潔又再次「遺忘」，一再反覆，此即尼采所謂「生成的無辜」，所謂永劫回歸。

Michalski 用「末人」(last man) 與「超一人」(over-man) 的對比來呈現這個永恆（之火）的一體兩面，對尼采來說，末人是一種人的理想典型，末人自稱「已發現幸福」，末人的幸福是肉體上的舒適，但他們恐懼受苦，末人們把幹活當作消遣，但卻擔心讓消遣傷害身體；末人也是「沒有牧人的一群羊」，末人們人人平等，也不再有貧窮與富有的區別，末人們不想統治別人，也不想服從別人，原因是兩者都不好受，但「超一人」不同，它是「人類生命的種種可能，這是『超人』所指涉」，超人不是人類發展的下一個階段，「不是一個典型，不是人的修正。查拉圖斯特拉用它來說明人之生命的未完成、不足與不完整，但不是對照某個東西或人」，超人所描寫的是「就其所是的人，人就其所是的生命，人之境況，超人是人類生命的意義」，超人是「橋」，「橋接到某個外長 (outgrow) 於我們之外....『超』把人類生命定義為一種使得某物外長於我們的努力，證成了生命不能只是『我的』這個事實」(Michalski, 2012: 159-60)。

Emden 與 Alejandro 的作品指出了尼采歷史書寫所著重批判的對象，他們分別強調尼采對於（特別是政治）概念絕對性與意義體系的重視，而 Lemn 與 Michalski 則主張尼采對歷史

書寫的重視乃在於提出「生命」這個問題意識，藉由尼采的「超一人」概念，他們兩人強調生命的轉化是尼采對歷史書寫問題的回應：生命必須轉化，在生命每一個去除線性時間與歷史重負時刻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中，生命成為各種力量的交會，從而成了各種轉化的可能性境況，易言之，尼采不是提出了「另一種」歷史書寫或時間性概念的體系，而是追問：如何在與線性時間與歷史的對抗中，通過生命作為力量的交會，不斷地開啟生命的不同可能性，這就是生命的生成，如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訪談中所說，「生成不是歷史，歷史僅僅只指出了各種條件的集合…而這需要被超越成為『生成為…』(to become)，去創造出某種新的事物」，這是尼采式的「歷史」，尼采的不合時宜！

其他參考資料

- Lampert, Laurence. 1993. *Nietzsche and Modern Times: A Study of Bacon, Descartes, and Nietzsch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undy, Craig. 2009. “Deleuze’s untimely: Uses and abuses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Nietzsche” in *Deleuze and History*, eds. Jeffrey A. Bell and Claire Colebroo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188-205.
- Oakeshott, Michael. 2000. *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On China

Henry Kissinger

張祐寧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壹、主要論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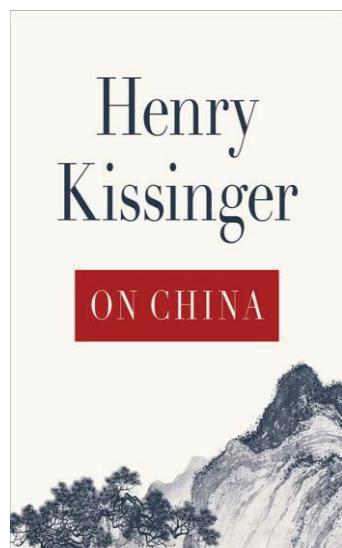
季辛吉的《On China》（中文暫譯：《論中國》）是從歷史與文化角度檢視中國過去的外交思想，並以之論述中共與美國自 1949 年以來的外交關係，最後用歷史類比來預測中美關係發展並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中國古典外交思想

在第一章的部分，季辛吉主要在論述中國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他提到了黃帝作為中國歷史的起源、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開創者」及中國獨有的「天下觀」與「朝貢模式」，並談到中國在面對華夷關係時會使用「以夷制夷」、「羈縻」或「五餌」等策略。比較有趣的是，他提到中國亦有「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觀點，其以《孫子兵法》與圍棋哲學為例，認為《孫子兵法》和西方學者對於戰略討論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強調心理與政治因素對軍事的影響，而非純粹地討論軍事，也就是「勢」的概念。另外，關於「圍棋戰略」的部分，作者指出西洋棋所追求的是「全面性勝利」，因為其目標是吃掉對方的王就獲勝。圍棋則追求「相對優勢」及「長期包圍」，它並不像西洋棋的棋子都已部署完備而且僅需透過正面衝突削弱敵軍人馬，而是向棋盤的「空地」盡量移動，以便逐漸削弱對手的戰略優勢，作者認為圍棋使人了解「戰略包圍」的概念，也創造了前述具有「戰略彈性」的「勢」。

二、毛澤東時期的外交政策

四到十一章是針對毛的外交政策進行評述，其中重點和前述中國古典外交思想有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將毛的外交思想與《三國演義》的「空城計」作連結：當毛面對美蘇兩大核武時，



書名：On China

作者：Henry Kissinger

出版者：Penguin Books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2011

頁數：624 pages

ISBN：9780143121312

其處理方式是「裝作若無其事」，他揭示了對於核武威脅的「不為所動」，事實上他更擺出願意犧牲中國數億人口來打核戰的姿態，季氏以為這是追求心理優勢的「中國式嚇阻」。另外，在韓戰發生之際，毛的戰略是嚇阻甚至是先發制人，作者認為與西方思維不同的是，毛所追求的不是軍事上的勝利而是心理上的平衡。韓戰結束後，毛同時面對了美蘇兩大強權的壓力，其戰略乃算定由於美蘇視彼此為敵人，因此才敢兩面對抗，在此作者便認為毛是應用前述諸葛亮的「空城計」，亦即將自身物質能力上的弱勢轉變為心理戰上的優勢。此外，在第一次台海危機時，兩岸的策略皆欲避免發生衝突並訴諸政治上的折衝樽俎，季氏認為這是《孫子兵法》在外交上的應用。而關於中印邊界衝突的問題，毛認為若印度在邊界多蓋一個前哨站時，那麼中國也要在旁邊多蓋一個並包圍它，毛稱之為「武力並存」，季氏以為這是「圍棋戰略」的運用。八至十一章將焦點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發展過程，作者認為毛的策略乃中國傳統外交思想的應用，其採用了「以夷制夷」和「遠交近攻」的戰略：面對美蘇間的潛在衝突，毛認為必須「坐山觀虎鬥」並和距離較遠的美國改善關係。葉劍英則引用《三國演義》當中諸葛亮的「隆中對」表示當三國鼎立時，劉備就必須「聯孫拒曹」，藉此指出中美聯手抗蘇的迫切性。

三、結語

在結語的部分，季氏以英國外交家Eyre Crowe的回憶錄為基礎來論述中美關係未來發展。作者提出一個核心的

問題：中美的戰略互信會勝過戰略威脅嗎？在Crowe的回憶錄中提到了英國要如何面對積極發展海軍的德國，他認為德國宣示哪些目標對英國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德國要發展海軍時，不論其意圖為何，對英國而言就是客觀的威脅。按Crowe的邏輯，中美可能會產生緊張關係，何況彼此有著迥異的文化認同、國家政策與利益認知，作者認為現實的障礙將阻擾美中的合作關係，然而其也認為雙方合作對全球穩定與和平是重要的。不過季氏也提到歷史類比是不精確的，就算最精準的類比也不希望當今世代重蹈前人的覆轍，畢竟若結果是個災難對大家都沒好處，因此他提出「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以避免兩國發生衝突。

貳、綜合評論

首先要討論的是，作者眼中的「中國古典外交思想」及「中國式現實政治」是否有效地解釋了中國外交的作為？例如關於毛的外交思想部分，作者認為毛不管在面對美蘇兩強、韓戰、第一次台海危機及中印邊界衝突等等，皆有上述兩種思想成分存在，甚至是鄧小平時期的懲越戰爭亦有此一思維。不過，作者僅提到毛鄧時期關於這兩種思想的應用，卻沒有針對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的外交政策有類似的著墨，僅提到近年來中國對於「孔子思想」的重視，但並無和中國的「和平崛起」有連結性論述。不過，值得讚許的是，開始討論「中國式現實政治」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否則「中國文化」若只有給西方一種「儒家思想」的印象時，那麼對中國外交的研究是相當狹隘的。

對於中美關係前景的看法上，本文認為作者之所以在結語提到 Crowe 的回憶錄無非是提醒世人不要重蹈一戰的覆轍，當然在地緣政治的觀點上，德國作為當時歐洲最強大的陸權挑戰英國首屈一指的海權時，的確和現在中美在亞太地區軍事競逐的情形若合符節，但作者也提到歷史類比是不太精確的，關鍵還是在彼此戰略意圖能否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配合中國古典外交思想來看，這裡牽涉到兩種歷史類比基準：一個是從英德爭霸來看當前中美關係的「跨國橫向比較」，另一個是從過去中國古典外交思想來檢視當前中國外交發展的「歷史縱向比較」。在「跨國橫向比較」上，作者以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挑戰英國海權為出發點，來作為對當今中美關係的反省，從地緣政治與海陸爭霸的角度來看是恰當的，然而作者並未從中國古典外交思想的「歷史縱向比較」來論述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至於在「太平洋共同體」的觀點上，作者參考了二戰後歐陸所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希望藉此來緩解中美潛在的緊張關係，然而就現實層面而言，姑且不論中國的主觀意圖，從客觀能力來看中國海權發展確實對美國逐漸產生威脅，因此了解中國決策思維便顯得重要。若依照中國古典外交的思維邏輯，中國即使在不利條件下也會發動先制攻擊以打破對方的心理平衡，從而創造有利局面以達成政治妥協，這也是作者所稱的「中國式嚇阻」。本文認為當今中國海軍「積極防禦」戰略中的「積極」便是指「先發制人」，而之所以採「防禦」是因為中國了解到自身海軍實力

仍無絕對優勢，能夠捍衛本身的海洋權益已不容易。因此，將來中美若能有更具約束力與檢證性的信心建立措施時（兩國已有《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但其規範仍僅為框架且充滿模糊性），彼此便能逐漸達成「戰略互信」，進而使作者的「太平洋共同體」理念更跨進一步。

氣候變遷的政治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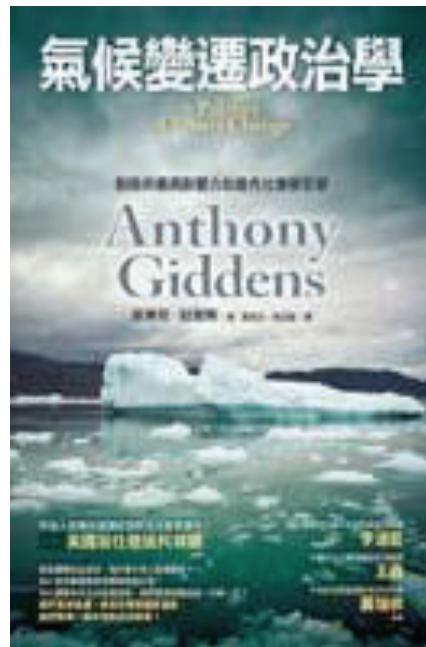
Anthony Giddens

劉昊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近年來，有關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與討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遷的問題已不再僅限於自然科學的研究，而逐漸擴延到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們在回應氣候變遷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包括氣候變遷和地球暖化對人們的影響劇烈，但是為什麼人們卻經常無法有效因應，甚至出現爭端與歧異呢？面對這樣的窘境，我們又應該如何有效地改進呢？這些問題逐漸成為近年社會科學界研究的新焦點。

將氣候變遷問題和社會科學接軌，研究國家、市場在氣候變遷處理上的問題的確刺激了一些新的想像，相關的一些討論領域如環境政治學、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等也孕育而生，然而，將氣候變遷問題與政治學研究相銜接，在研究產量上畢竟還不算大宗，氣候變遷的政治研究主要也集中在政策方面的研析，而且主要是包含在環境政治的領域下進行附屬的討論。著眼於此，Anthony Giddens 這本書的目的便希望發展一個「氣候變遷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其目的不僅在於提升學者們重視氣候變遷問題中的政治因素，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塊新的獨立學術場域來堆砌研究基礎。當然，Giddens 之所以倡議建立一個氣候變遷的政治學研究，部分原因在於他透過在國際、國家、社會面向的觀察，體認到「國家」不論是在由上而下 (top-down) 還是由下而上 (bottom-up) 在治理暖化問題上角色的重要性。因此，國家為何如此重要？而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又應該如何行動？成為本書主要論證的焦點。



書名：氣候變遷的政治學

作者：Anthony Giddens

出版者：商周出版社

出版地：台北

日期：2011

頁數：318 頁

ISBN：9789861207452

二、主要概念與論點

(一) 國家的角色

首先，Giddens 認為，面對氣候變遷對人們巨大的衝擊，國家有責無旁貸的義務必須挺身而出，建構一套有系統有計畫的方式因應並加以制度化。他主張，世界上的工業國家必須率先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而其成功的機會多半取決於政府與國家的力量而非其他組織。雖然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國際協議的締結有其必要，也不排除其他許多機構，包括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和公司企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無論如何，要面對全球暖化產生實質的影響，仍需要運用國家掌握的諸多權力(Giddens, 2011: 131)。因此，Giddens 提出「保證型國家」(ensuring state)的概念。他認為，談到氣候變遷時，國家必須扮演促進者和推動者的雙重角色，它必須協助促進並支持社會中各式各樣的團體發展出前進的政策，不過國家不能只是推動的機構，它還必須有能力創造出具體的成果，此種成果不只有其公民可以仰賴，其他國家的領袖也可以信賴與仿效(Giddens, 2011: 31)。換言之，國家—包括在國際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和國內意義上的中央政府—重要性在於擁有其他行為單位所無可比擬的權力與資源可資運用，有充足的資源能力來促進社會發展新的技術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¹也可以透過具有強制力和拘束

¹在國家的促進者角色上，Giddens 很強調國家在稅捐與補貼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可以促進企業發展替代性綠色能源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另外，國家也可以透過財政政策，改變人民日常生活習慣。更詳盡的內容請參考本書

力的政策對於市場和企業進行管理，將環境的外部成本予以內部化，降低市場失靈的情況。²因此，國家不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在因應氣候變遷時都是不言可喻的關鍵性角色

(二) 提出建言：多面向的國家環境政策

在提升國家的重要性之後，Giddens 檢視了歐洲幾個重要的國家諸如瑞典、德國、英國，並擷取它們的經驗，建議國家在幾個方面必須要以長期計畫性的方式，來推動政策因應氣候暖化的問題，避免短線的操作。在政治議程方面，他提出一種名為「紀登斯的弔詭」(Gidden's paradox)的概念。由於氣候變遷問題具有潛伏的特性，全球暖化帶來的危害，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有形的、立即的、明顯可見的，許多人依然會袖手旁觀，未採取實際的作為。不過，等到這些危害已經相當嚴重時再來行動卻已太遲了(Giddens, 2011: 24)。因此，政府有必要將氣候變遷的風險透過政策議程的形成過程中，竭力將其予以「前台化」(foregrounding)，使其不斷地受到民眾的高度政治關注，讓全球暖化的問題持續留在核心的政治議程中，而不會輕易地被其他的政治焦點稀釋。另外，也要避免政治人物利用暖化和氣候變遷議題進行「姿態政治」(gestural politics)的操作，形成另類獲

第六章。

²所謂的環境外部成本，這樣的經濟學概念指的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市場邏輯下，營運的過程中將污水或廢棄物排出廠外，卻不加以處理以降低成本，而導致其他人必須承受污染物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便是市場失靈一部份，因此政府有必要出面加以管制，要求廠商將外部成本予以內部化，避免其他人受害。

取政治權力的工具(Giddens, 2011: 25)。

此外，在市場方面，他傾向主張更進一步的干預與管制市場，以確保「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能夠徹底的制度化，在碳排放交易市場等機制上進行充分的成本定價，以避免企業利用類似機制逃避環境成本責任，並且利用補貼或課稅的方式誘導企業提高能源運用的效能或再生能源的轉型。

在社會方面，Giddens 認為在民主國家中，所有的政策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然而在「紀登斯的弔詭」下，氣候變遷問題往往難以維持民眾的關注和提升民眾願意付出成本的意願。缺乏風險感知和個人責任的稀釋，共同構成這種「搭便車」(free rider)的行為現象。Giddens 認為，這需要政府以積極正面的方式鼓勵民眾改變消費習慣與日常生活方式，透過優惠政策形塑新生活習慣與低碳生活的實踐，會比負面風險恐嚇的方式形塑恐懼來的有效且影響更為深邃。³有關社會面向的論點是 Giddens 在討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問題時的一大亮點。

(三) 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與綠色運動

再者，Giddens 在看待環保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態度上，沿著強調國家角色的論述邏輯，認為保證型國家需要各種社會團體的合作來協助實現減

³Giddens 認為形塑氣候變遷的風險來造成社會大眾心裡的恐懼，並不能長期有效地提供抗暖化政策的穩定支持，因為人們是健忘的。除了時間會稀釋恐懼外，人們的恐懼也可能隨時被其他的恐懼所轉移(例如失業或不景氣的恐懼)。因此 Giddens 認為與其仰賴風險感知，不如利用誘因政策根本改變消費習慣來的長期有效。

緩氣候變遷的目標，而非政府組織在監督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形塑公共意見和提供科學資訊上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iddens 對於經常附隨於氣候變遷議題之後，更廣義的綠色運動與綠色政治思想抱持批判性的質疑態度。這是因為部分綠色價值觀(如生態法西斯、深層生態主義、生態地方主義)越來越自然主義與反政府的傾向，不僅與全球暖化的問題失去緊密連結而失焦，更脫離了 Giddens 所強調的民主政治體制架構，而成為另類的左右派政治意識型態爭執的工具。因此，Giddens 雖強調社會團體的角色，但須置於促進保證型國家的政治運作體制中。另外他也重新檢討了綠色運動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包括預防原則、永續發展、使用者付費原則—排除不適用的部分後，將其融入氣候變遷政治學的概念框架。

(四) 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匯流

另外，Giddens 也不斷強調「利益的匯流」(convergence of interest)在推行環保政策與爭取支持過程中的重要性。必須把減碳利益與其他場域的利益相互連結，才能提升實踐環保政策的誘因。例如，在政治匯流上，將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與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相輔相成，包括國家能源安全與規劃，以及導向超越國內生產毛額的福利觀，讓減碳與公共政策推行的各種轉型相結合，才能創造更大的減碳效益來獲得民眾支持。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匯流的方面，提升低碳技術與鼓勵更具競爭力的商業營運模式。從這個「低碳經濟」的角度來說，

減碳便不再是增加企業的成本，促進能源運用效率是減少企業成本的一項有效工具，使得減碳與企業的經濟利益相結合，促使企業更有動機和誘因進行能源使用的檢討與轉型，不過這當然需要政府推動誘因政策來促使企業檢討改進能源的使用。

(五) 地緣政治

最後，Giddens 將討論的另一個焦點放在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的關注上。他認為大多數對於氣候變遷的討論，並未與地緣政治或是能源安全的問題產生具有實質連結的討論，事實上，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能源短缺以及相應的能源安全與爭奪，在國際舞台上顯得越來越明顯且劇烈，包括中國與周邊東南亞國家在水資源上的齟齬，還有美國加拿大在北海石油與航運資源上的競奪，都形成新型態的國際衝突來源。Giddens 指出，事實上這些新的環境與資源問題並非無解，透過利益匯流或經濟匯流的三菱鏡，可以發現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存在互利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已開發國家（如美國）透過能源技術的轉移，提升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在能源效率上的提升，可以同時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兼顧減碳的利益，而已開發國家也可以藉由獲得市場的通路，獲得綠色商品市場的商業利益，這樣便是雙贏的策略。不過，Giddens 也檢討了現行《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認為雖然其方向正確，但是實踐的過程中缺少技術的實質轉移，利用清潔發展機制的國家數也很少，以致於需要對

機制的運行進行更深層的檢討與改進。⁴

三、評論

綜合觀之，Giddens 藉由考察歐洲國家應對氣候變遷的經驗，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觀察與反省，並且嘗試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Giddens 在論氣候變遷的治理時，與多數美國學者不同的是，他更為強調政府的主導性地位，並展現出對於市場機制的治理模式較高的不信任感，認為唯有國家才能以長期有計畫的方式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問題，市場機制仍必須在政府的控管下進行才能發揮效能。相較於越來越多推崇市場導向政策的學者們而言，Giddens 的確獨樹一幟。不過筆者認為，Giddens 論述的方向並非建議政府在減碳和控制暖化的問題上開回高度管制性政策的倒車，而是藉由歐洲國家的經驗，提醒我們如何透過國家的手促使市場性機制更加完善成熟，而最終能夠有效地促進企業提升能源效能達到環境與經濟利益共利，而非讓企業藉由諸如碳市場等機制規避責任。此外，強調利益的匯流也提供吾人在思考如何解決在環境變遷的議題中，似乎又激起的經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問題，利益的匯流提供了比「永

⁴有關清潔發展機制 CDM 的問題包括：第一，京都議定書到期後的國際制度尚未確定，不確定性減低了 CDM 市場的發展動機。第二，CDM 市場主要提供的是氟化烴 (HFCs) 和氧化亞氮 (N₂O) 等化工類項目，但這些項目都不是投資者的首選。第三、CDM 在地理區域上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美地區，廣大的非洲地區交易明顯不足。第四、相應的投資不足。這些問題可參考「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一書(莊貴陽、朱仙麗、趙行姝，2009) 的討論。

續發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模糊性的抽象概念更多可操作的實務空間，而在經濟匯流上日漸發展出的「低碳經濟」模式似乎也日漸躍升為發展模式的新主流，同時滿足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和提升發展中國家經濟與能源效能的兩面需求。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本書的另一亮點在於，Giddens 藉由其社會學思想的背景，重新描繪氣候變遷下的政治社會問題，在處理暖化的論述上，Giddens 整體來說延續了他之前對於現代性，全球化，風險社會的主題，包括提出「紀登斯的弔詭」，來描述類似風險環境下集體行動的困境，他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有別於一般的規範論，Giddens 認為可以透過政府來型構民眾對氣候變遷風險的認知和關注，並且進一步透過政策機制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模式來實踐綠化的新生態，這樣的做法才能在民主國家中提供政府在抗暖化政策上持續且穩固的支持，有足夠的政治資本才能給予企業轉型和創新的壓力來落實抗暖化政策，而這樣的論述也與近期越來越重視的公民社會的環境治理趨同，值得我們關注。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雖然 Giddens 高倡建立氣候變遷的政治學，但是全書對於政治學中重要的權力、利益概念，在氣候變遷政策中的作用力說明較少，舉凡國內各利益團體與官僚體系在形塑國家氣候變遷政策上的利益衝突與妥協，國際氣候談判上已開發和未開發國家在減碳權利與義務上的立場不一致，所造成日漸分裂的集團化對壘趨勢（如歐盟、傘狀集團、77 國集團+中國、小島聯盟）

與談判僵局都付之闕如。換言之，Giddens 筆下的氣候政治學在應然面確實提供許多有洞見的新概念和政策，然而在政治實然面的剖析就相對缺乏，形成有缺陷的政治學分析。

最後，Giddens 相當強調國家在促進氣候變遷減緩政策上的積極作用，的確，國具有其他政治行為者所無法比擬的資源能力，然而，這還涉及能力與意願的問題，在先進國家的政策脈絡下，國家不僅有能力也有意願去推動氣候政策的改革，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主導了國家政策，尤其在多元主義的民主模式下，國家政策由利益團體的利益競爭所決定，強大的企業利益團體制肘下的政府，是否能如 Giddens 所言扮演積極推動者的角色，則或許並不那麼樂觀。

參考文獻

莊貴陽、朱仙麗、趙行姝，2009，《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浙江人民出版社。

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
Yves Tiberghien

謝濬帆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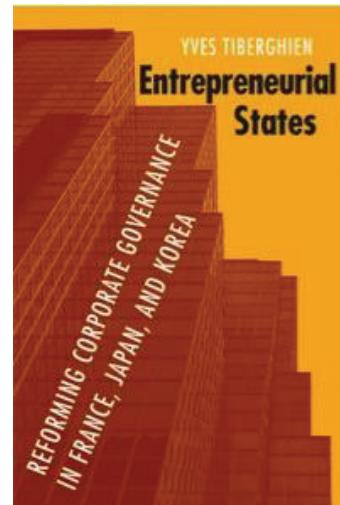
一、前言

在全球化興起的八、九零年代時代至今，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以及資本的高速流動已經改變了既有戰後的政治經濟。過去已開發國家以凱因斯導向的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或是國家主導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隨著全球化都逐漸改變了其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相關行為，然而，不同國家順其而為的改革與對應策略，卻隨著特定國家本身過去的歷史遺產連結，而有了路徑依賴的現象，而使得即使相似的國家主導模式經濟（state-led economy），在改革的歷程中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以至於出現不同改革的模式與效果。

正是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下，作者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Yves Tiberghien 建立在這個學術爭辯的基礎上，透過討論三個國家公司治理改革的案例來討論，為何這些國家中像是法國和韓國走向了一個長期發展（long-term development）為展望的改革，然而日本的漸進式改革卻顯得相對緩慢、無效率或甚至選擇性的調整？本書透過了政治資本家少許行為者的誘因，來解釋整個國家公司治理改革的制度變遷以及立法，從微觀到宏觀層次的分析，使我們理解到在比較政治學討論中，政治菁英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

二、論點與方法論

在過去討論改革與現任者利益的衝突時，總是將現任者視為改革上的阻力或是障礙，基因於現存



書名：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
作者：Yves Tiberghien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Ithaca and London
日期：2007
頁數：280 頁
ISBN：9780801445934

體制對於現任者是利益相關人，所以不會輕易承擔改革的成本；然而作者卻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反向思考現任者如何在政治競爭中保持優勢，透過與外部力量的結合，來強化自身的在位優勢以及延續性，所以衍生出了從社會契約轉化到 golden bargain 的制度變遷。這個立論的基礎是過去戰後國家為了避免高度失業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以至於有二戰陰影下的戰後社會契約的資本主義模式，也就是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誕生，然而，這個以社會穩定為前提的利益相關體系，到了全球化時代，必須面臨相對彈性的生產要素的移動，最為顯著的就是資本；對自由資本的競爭形成了現今無可避免的難題，因為這樣的移動模式改變了既有的國家與產業對於工作者連結的社會保障，當關係出現變化時，也考驗已開發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處理手段，與是否能夠進行制度變遷的改革。

於是作者提出了”golden bargain”的概念，當既有國家主導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模式與全球化相遇時，無可避免的必須透過改革來強化競爭，以爭取自由資本的流入，然而過去社會契約的利益抵觸在民主國家會產生選舉壓力，作者針對這個部分認為 golden bargain 著重在政治資本家與外資的妥協，透過修改企業重整與公司治理相關法規與政策工具的干預，在某程度會使社會反彈造成壓力，然而吸引外資進入後所產生的利益則可以帶來政治人物本身實力的增加，與可能的長期均衡與削弱既有利益團體或競爭者的相對挑戰，所以這些政治菁英像是

資本家一樣規劃並進行豪賭，所以作者稱作 golden bargain。

三、法國

過去戰後法國的產業以國營企業為主，較為著名的為法國航空或是法國電信，然而九零年代初期政府開始透過私有化的手段嘗試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自由資本，但當社會黨在取得國會聯合內閣多數後，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於 1997 任命喬斯潘（Lionel Jospin）出任法國總理，又再一次左右共治（cohabitation）；此時的喬斯潘過去立場較傾向反對私有化所造成可能的問題，包括因為民營而無法保障過去國營員工的權益，以至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然而內閣當中的財政部長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本文使用簡稱 DSK），本身立場較偏向自由化市場經濟下，政府扮演利害相關者之一，持股而非完全主導的股東型態地位，所以支持過去私有化的政策延續。

然而這樣的政策核心本身和總理以及過去社會黨的支持者立場相對較有差距。作者認為喬斯潘考量了內閣的政策手段將會影響社會黨的被支持度，為了長期展望 2002 年的總統大選，社會黨必須透過擴大支持基礎，所以也支持 DSK 的私有化政策；接下來一連串的政策走向直接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透過 IPO（首次公開募股，指進入證券市場發行上市股票）來吸引許多外國企業或資本的投入，在社會黨 DSK 擔任部長期間，超過 2,000 億歐元市值的國有資產遭到販售，而法

國經濟成長也增加，並獲得失業率的下降，儘管在之後的總統大選雖然沒有達到社會黨的預期，但此次改革仍可看出法國的制度變遷透過的手段是迅速且分責清楚的。

四、日本

和德國被當作戰後經濟發展教科書的日本，雖然不是以國營企業為主，但國家在經濟和產業政策的介入仍是相對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九零年代的泡沫經濟使得日本必須在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下作出轉變，但無論是自民黨或是多黨聯合的內閣，都無法在國會有效立法來改變財閥與日本經濟的緊密性，作者認為這基因於派閥政治與利益共生，使得立法始終處於僵局。

到了橋本龍太郎與小淵惠三後，零星的企業再生法與公司治理規章漸漸立法，然而根本問題是日本的公司治理過於依賴在政商關係中的借貸，使得既有派閥政治人物缺乏改革動機或是沒有處理根本財閥與經團連的影響力；小泉純一郎的出身並不是獲得自民黨內強勢派閥的支持，於是透過了郵政改革等其他法案嘗試吸引更多的外資，並減弱自民黨對於既有財閥的依賴，以理性選擇來說，這的確是小泉在黨內派系林立可能的競爭策略，然而只是透過去管制化的手段，而缺乏公司治理改革的相關配套措施，日本至今還是處於局部的分層改革，核心問題仍有待解決（例如近年來的日本航空破產事件），包括像企業再生法、破產保護相關，以及企業交

易持股對於股東權益的保障仍有待改善。

五、韓國

金大中作為首位出身全羅南道的總統，本身是過去反對慶尚道與執政保守勢力的政治人物，本身厭惡過去韓國財閥（chaebol）與政界的政商關係，上台後企圖去改變與企業的關係，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提供了一個方便的途徑，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借貸韓國許多復興基金借貸，條件希望韓國進行自由化之中強化公司治理改革，金大中透過這個機會，通過許多政策並限制了許多過去財閥的權力，終於使得韓國改善了金融體質，融資流通保持在如OECD國家的財務風險評估，並在此環境下重新強化公司治理改革。

六、結論

即使本書三個個案都是在全球化後的公司治理改革，然而在改革手段以及層面上仍有所差異，因為在手段上有國家直接透過介入與否、以及改革規範是否擴及普遍有效與否；在這兩個層面上韓國是比較特殊的通盤改革，與日本與法國相較起來，三個國家都立基於OECD戰後中較具政府介入經濟事務層面，然而在企業重整上卻有不同的結果：日本面臨了有限且片面的調整，法國透過國營企業釋股、私有化來強化市場經濟，韓國則是強化金融監督管理與企業界代的標準且改革。

作者透過了三個案例的比較，不同文化地區的視野，看待過去國家主導的三個案例，如何因為政治菁英企圖強化並打擊既有政治經濟勢力，而作出的政策手段及影響制度變遷，然而這三個案例不同的過程與結果，是基因於政治資本家在面臨過去制度與政治經濟互動的鑲嵌性，這點雖然作者認為 VOC（資本主義的類型）框架無法完全解釋，但似乎作者的解釋在偏向以現任者與挑戰者競爭的論述中，仍沒有放棄解釋政治體系（內閣、總統、半總統制）對改革的影響層面。

大體而言，回應了日本與法國在改革歷程的差異：日本的內閣制與自民黨的派閥問題與政商關係，使得改革片段且裹足不前；法國半總統制在左右共治中權力轉化至總理與國民議會，而社會黨在國會多數下總理與部長受到的改革衝擊也遠較日本小；韓國案例下的金大中身處總統制，但又面臨亞洲金融危機，金本身具有制度下的權力優勢，又有因為國際借貸條件的改革正當性，所以得力於既有制度以及改變既有制度力量的融合（總統制與國際貨幣基金），使得改革層面和手段上跟前兩個案例有所差距。

由此可知，政治菁英在尋求全球化下的外資引進時，也就是本書圍繞的 golden bargain，改革的目的都是在於政治菁英強化既有的影響力延續，然而手段卻因為既有政商關係以及政治體制而有不同的限制與差異，我認為這是一個路徑依賴下（path dependence）的 golden bargain，也就是政治菁英的選項也是有限理性的，在

這個層面上，討論全球化後 OECD 國家的公司治理改革與國內政治影響，本書是的確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角度或面向。

【《政治科學季評》招募編輯與審稿委員】

各位讀者您好，創刊至今已超過 34 期歷史的《政治科學季評》，每期皆有來自包括比較政治、公共行政、國際關係、政治哲學與思想、（歷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不同領域的書評或書目稿件。著眼於《政治科學季評》是一份由師生共同組成的投稿與審稿園地，這些稿件的審查和編輯歡迎且需要您的支持與襄助。

因此，若您有興趣加入季評審稿和編輯行列的話，請至以下網址填寫資料：<http://0rz.tw/mvpSJ>。未來，我們會視投稿文章屬性與您的專長和興趣領域，安排稿件給您審查。謝謝您熱情參與。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季評專屬工作信箱：poliscireview@ntu.edu.tw，謝謝！



【政治科學季評第 36 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 截稿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以前。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前往 <http://politics.ntu.edu.tw/?p=583#rule-3> 下載投稿表格
- (二)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ISSN 2222-6788

9 772222 678008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346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